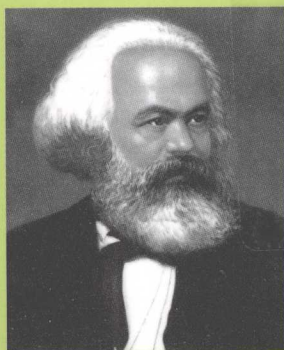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 经典论述研究 (下)

ZhongGuo GongChanDang GuanYu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ShiDaiHua DaZhongHua
JingDian LunShu Yanjiu

张 琼◎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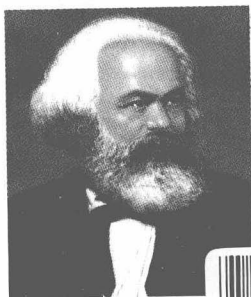
YZLI0890191277

线装书局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 经典论述研究 (下)

ZhongGuo GongChanDang GuanYu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ShiDaiHua DaZhongHua
JingDian LunShu YanJiu

主编◎张 琼 副主编◎孙金华



YZLI0890191277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
论述研究:全3册 / 张琼主编. —北京:线装书局,
2012.12

ISBN 978 - 7 - 5120 - 0842 - 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
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8944 号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全3册

主 编:张 琼

责任编辑:张媛媛 孙嘉镇

排版设计:秋 水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52

字 数:1078千字

版 次:2013年5月北京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000册

定 价:128.00元(上、中、下)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上 篇	9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 11
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 50
江泽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 87
胡锦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 106
中共其他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 174
中 篇	185
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187
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267
江泽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327
胡锦涛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471
下 篇	547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 ~ 1949. 10)	/ 549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1949. 11 ~ 1966. 4)	/ 642
“文化大革命”及两年徘徊时期(1966. 5 ~ 1978. 12)	/ 681
改革开放时期(1978 · 12——)	/ 692
主要参考文献	807
后 记	810

下篇



本篇主要对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及中共中央文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摘编。该部分一是阅读了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文选、选集、文集等文献资料,如《陈云文选》3卷、《董必武选集》、《李先念文选》、《彭真文选》、《张闻天选集》、《李富春选集》、《李维汉选集》、《李大钊选集》、《陈独秀选集》、《瞿秋白选集》、《方志敏文集》、《邓中夏文集》、《恽代英文集》2卷本等资料;二是阅读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七大”以来的重要文献资料及汇编,在系统研究阅读的基础上进行了摘编。因为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等涉及的人物众多,思想内容丰富,时间跨度较长,所以,在摘编时采取了分时期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摘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 ~ 1949. 10)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迹,永久不能消减。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选集》第228~229页。

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挥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选集》第229页。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选集》第230页。

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选集》第231页。

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选集》第233页。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了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选集》第233~234页。

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选集》第234页。

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况、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李大钊选集》第302页。

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1920年1月25日,“新生活”第23期),《李大钊选集》第308页。

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与我们携手,时常将其所在的工厂、制造场和一切生产机关的内容组织,现在办理情形,所出产的物品概况,工人的数目种类——如男女老幼,待遇的情形,工钱的制度,做工的时间,工场的规则等,和工人自己个人的生活情形,感想的意见,对于家庭的关系等一切情形,随时详细详细的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发表出来,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那就是我们出版这《劳动音》的本意。

邓中夏《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1920年11月7日),《邓中夏文集》第2~3页。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世界经济势力之外。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李大钊选集》第341页。

在这种势力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李大钊选集》第342页。

希望诸君听过这次讲演马克思学说大体之后,能够引起点兴趣,去研究他的学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这是我最盼望的。

李大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年2月21~23日,“晨报”),《李大钊选集》第363页。

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怎样叫实际研究的精神!说来很为繁杂。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怎么叫演绎法?就是以—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个原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

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样罢了。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原载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陈独秀选集》第162~163页。

人类社会因治生方法不断的进步,他们经济的及政治的组织遂随之不断的进步。

在这不断的进步之过程中,保守者与改革者亦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两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断的争斗;每个争斗的结果,后者恒战胜前者,人类社会是依这样方式进步的。照前人依据历史的事实指示我们的: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即不断的争斗中,依治生方法之大变更扩大了他们的生活意识,他们利害相冲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两次最大的阶级争斗,第一次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第二次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所以人类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争斗,都有阶级争斗的意义含在里面。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原载1922年6月《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陈独秀选集》第164页。

在这种世界政治的经济的状况之下的中国,他也是被压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经济是自然要受环境支配的。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因为受了列强在中国所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治的状况,也可分为下列三种(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军阀的扰乱,幼稚的资产阶级和幼稚的无产阶级)。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原载1922年6月《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陈独秀选集》第165页。

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原载1922年6月《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陈独秀选集》第166页。

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原载1922年6月《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陈独秀选集》第169页。

象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怎样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怎样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怎样造成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怎样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在马克思学说里叫作“经济的历史观察”,又叫作“唯物的历史观察”。

陈独秀《马克思的学说》(原载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陈独秀选集》第175页。

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

说和阶级斗争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陈独秀《马克思的学说》(原载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陈独秀选集》第176页。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斗争的。其中要义有二:(一)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二)阶级之成立和斗争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

陈独秀《马克思的学说》陈独秀选集,第177页,(原载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陈独秀选集》第177页。

“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

陈独秀《马克思的学说》(原载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陈独秀选集》第181页。

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5月),《瞿秋白选集》第3页。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5月),《瞿秋白选集》第3~4页。

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尽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象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5月),《瞿秋白选集》第4页。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青年》上来,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5月),《瞿秋白选集》第7页。

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法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这一方针固然非常之明确,然而实际运动之时,尤须时时不忘科学的方法、缜密的考察,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应的方法,以及东方民族内部运动之阶段,都必须是极慎重的研究。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923年3月),《瞿秋白选集》第20~21页。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这些对抗力之中,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现在只有民族主义的觉悟;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外国资本的侵略却正在日益加紧,自然而然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步,在中国现时经济状况之下,便表示于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然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更非有劳动阶级的革命行动不能成功。此“最后之市场”——中国,若能奋起,世界帝国主义必然受非常之打击,而世界社会革命乃不得不爆发。

瞿秋白《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1923年6月2日),《瞿秋白选集》第52~53页。

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瞿秋白《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1923年9月23日),《瞿秋白选集》第55页。

所以现时必定要:“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于经济的及政治的斗争。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斗争到政治的斗争。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的宣传‘国民运动里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目的’。”(陈独秀之《论国民运动及国民党》)

瞿秋白《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1923年9月23日),《瞿秋白选集》第88页。

中国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做,第一要明白他责任重大,而不可自弃,这是因为国民中只有学生比较是醒觉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

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要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两点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和欧美的学生界不同的地方。

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原载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第1期)《陈独秀选集》第186页。

物质文明是技术,科学仅仅是从技术里抽象而得的总原理。技术有神秘性便是封建时代的文明,技术有科学性便是资产阶级的文明,技术更进而有艺术性便是无产阶级的文明。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1923年11月8日),《瞿秋白选集》第97页。

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彻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对于技术文明的两种观点于是得一校正的机会。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1923年11月8日),《瞿秋白选集》第98页。

社会主义颠覆现代文明的方法于思想上便是充分的发展一切科学,——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艺术文明是应当由这条路进行的;而且要人类自己的努力。历史或社会学中的有定论是客观的,并非主观的宿命论,他仅仅是努力的向导。物理学家并不因为研究出电力的因果律,便应当让“雷公公和电娘娘”打死,却反而能指使这种“公公和娘娘”,使他们变成人类的奴仆。同样,社会科学中的有定论派亦并不因为发见了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律,便应当听天任运的让资本主义照着资本家的心愿去发展,却反而可以在这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决定更正确的斗争方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1923年11月8日),《瞿秋白选集》第109页。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原载1923年11月13日《新青年》第2期),《陈独秀选集》第194~195页。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

一、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应当先求之于社会的最后原因;不能以个人动机或群众动机作为社会现象的唯一因素,当再求此因素之因素。

二、社会现象确有因果律可寻;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律之“自由”。

三、人的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果,既成社会力量之后亦能为社会现象之因;然必自知此因果联系,人的意志方能成社会现象之有意识的因。

四、社会的有定论以科学方法断定社会现象里有因果律;然后能据此公律推测“将来之现实”就是“现时之理想”。

五、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会的实质”——经济;由此而有时代的群众人生观,以至于个性的社会理想;因经济顺其客观公律而流变,于是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出适当的个性。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

历史的工具运用“必然”的公律,由个性而阶级而人类,由无意识而有意识,成为群众的实际运动;群众运动的斗争正需要此历史的工具,社会的实质亦已能产生此历史的工具,于是方开始从“必然世界”进于“自由世界”的伟业。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然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必须知道社会律。

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1923年11月24日),《瞿秋白选集》第127~128页。

教育宣传方面——能多设补习学校或讲演所固然很好,如一时力量来不及,利用现成的教育机关亦可。至于其他如露天讲演以及新年大节休暇时聚会娱乐尤应利用时机宣传,方法愈多愈好,不细说了。但是中国纯粹农民劳动者(雇工)究不及自耕农佃户之多。所以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因为一般农民私有观念极深,真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如果我们用那样多高的口号,不是反而把他们吓跑了吗?我们的宣传口号只能用“限租”,“限田”,“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这一点极其重要,运动家不可不特别注意。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邓中夏文集》第58页。

中国自有思想革命以来,已经有不少主义: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等等。这许多主义所以发生的原因,都是对于旧社会不满意,想另外找出一个理想的社会来补救的。但这些主义都是从外国裨贩而来,是理想的和抽象的。究竟在中国能够发生什么影响和关系,尚是一个问题。

瞿秋白《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年1月16日),《瞿秋白选集》第130页。

新思想所以在最近发生的原故,并不是五、六年前的人如此呆笨,五、六年后忽然聪明起来,这完全是由于中国经济变动,由此变动而意志,便有所谓新主义输入。

至于三民主义的发生,是完全由于中国现实经济状况而起的,是中国已需要此种主义,完全与外来的乌托邦说不同。三民主义与基尔特主义等的分别,因为一个是中国经济情形本身有此要求而发生,一个是空想的和理论的。

瞿秋白《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年1月16日),《瞿秋白选集》第130页。

如此说来,三民主义是整个的,是浑然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必完全达到三民主义,然后可以说革命成功。

在三民主义未达到以前只有革命。所以三民主义的定义是很简单的,并不是个乌托邦新社会,是由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要求,才产生这三个革命原则:

民族主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世界各民族的平等;

民权主义:中国平民群众的政权,使政府真能代表全民族;

民生主义: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工人、农民)的生活之保障,使有真正参政之可能,使得到从事于征取经济权之一切必要条件。

既然不是一种空想的社会,而是现实的革命原则,就不能当他是一种固定的制度,却要人去实行。这种革命原则,我们可以当他是平民意志的结晶,是平民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农民、工人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意志之表示。

既然如此,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的一种口号,是从事革命的目标,是平民组织团结力量以达到革命的旗帜。研究三民主义,并不是合理不合理与理想高明不高明的问题。三民主义达到不达到,完全看我们平民力量与军阀势力之消长如何:平民力量大一份,三民主义也达到一份;反过来说,军阀势力大一份,三民主义亦少得一份。我们在今日只有努力革命,至于何日可以完全达到,我们暂时可以不必问。更不必说最理想的社会。反正在中国的现状,总不是什么理想社会;第一步必须先打破现状,而三民主义便是最切近于这现实需要的。三民主义的实现,完全靠我们革命的力量,向反革命派进攻。国民党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代表全中国平民的利益的,所以能组织平民,集中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作战,这是国民党应有的责任,也是平民应有的责任。

瞿秋白《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年1月16日),《瞿秋白选集》第132~134页。

认真组织起来,做全国大规模的各方面、各部分互相关联的有意识的斗争。于是中国革命的新篇开始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便是这新篇的第一页,因为他表示很明显的革命原则,做决心改组的意志,这就是开始集中中国革命势力,以从事于有意识的彻底的斗争。大会有这样的责任,可从大会宣言中看出来。大会宣言是以前所没有的,三民主义因此得有良好的界说,是数十万国民党员共同意志的第一次表现。无论何人皆由此同一目的做去,违反宣言的便不是国民党员。其次,宣言里有一般平民的政治经济要求——

国民党对现在政治的政纲;从前国民党只注意军事,而不注重其他,现在则全中国的国民党员都有一致对于政治经济的要求,用此去运动、宣传平民群众,使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有力的中心。再其次,宣言里明白说出国民党力量在于农民、工人身上。从前国民党的力量,不过少数人的奋斗,其余都不管;以前以为可用兵力征服民敌之后,再来按部就班的照着书上写好的计划办理,现在却已经知道三民主义是平民自己的要求,当将平民实力组织运用,使在斗争的过程里,炼出实行主义的力量来,而革命军仅是平民力量中之一特殊形式而已。

瞿秋白《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年1月16日),《瞿秋白选集》第135~136页。

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在于他能明悉社会进化的趋向,振作自己的革命意志,指示出运用客观的环境以达人类的伟大目的之方法。所以他是全世界受压迫的平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瞿秋白《历史的工具——列宁》(1924年3月9日),《瞿秋白选集》第138页。

教育方面——多设法设立或参加农村学校和书报社,作农民之识字运动,由此把农民间的文化提高。关于时事之演讲,唱本之改良,新戏之革新,幻术影戏之添置,亦当尽力推行。农民教育是我们一条最稳便而有效的道路,如果把这一层办到了,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踏进去了。在此尚有两点,须连带一说:第一、对于各省的初级师范学生和小学教师须特别向之宣传,与之连络,因为他们是与农民接近的。第二、对于办设农民学校(学校名称可酌定)不妨和比较好的乡绅与地主共同发起,因为可得到他们经济的和政治的各方面的援助与保障。

邓中夏《论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1924年3月29日),《邓中夏文集》第70页。

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

李大钊《这一周》(1924年5月1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李大钊选集》第487页。

这种研究的答案,自然是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

李大钊《这一周》(1924年5月1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李大钊选集》第488页。

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不但对于中国工人是当然的同盟军,就是对于全中国都是民族解放唯一的最好的友军。中国的仇敌是列强资产阶级,而各国内劳工阶级的五一运动正是反抗这些资产阶级的国际运动。中国的解放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援助,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中国平民的民族民权主义,没有国际的民主主义是决不能实现

的。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上是国际主义。

从五七到五四,从五四到五一——中国的一星期已经尽情显露世界平民的革命阶段了。

瞿秋白《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五四——五一》(1924年5月4日),《瞿秋白选集》第142页。

照实验主义说来,一切理论不是解释疑谜的答案,而只是工具罢了。凡是一种理论,一方面是我们对付外界的手段,别方面是一种逻辑的工具,如此而已。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在于这种知识能否促进我们的某种行动。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照实验主义的意思说来,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某种学说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实的;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一切真理都应当合于我们的需要。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他实用上的结果而定。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1924年8月1日),《瞿秋白选集》第147页。

实验主义的意思,以为真理自身并无何等价值。每种学说必须与人的实际需要发生关系,方能成为真理。假使宗教能帮助我们经营实际生活,减少我们生活里的苦恼,那么,宗教亦是真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实际上真理是否能作如此解释呢?不然。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方能是有益的;思想的积极精神必须反映现实里的积极精神。事实上无所用其“积极”的地方,单是我们主观的努力是无用的。一定要客观世界给我们一个保证:保证客观里的一切发展是依定律的,这些定律可以做我们人的行动的指导的,那时方有积极之可能。如今实验主义只问理论能否做人的行动的动机,那就是承认一切催眠术式的学说亦是真实的。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1924年8月1日),《瞿秋白选集》第148页。

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和愿望完全依着我们的利益而定的,所以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再则,各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所以实验主义便只能承认:有几种利益便有几种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的互辩律的唯物主义很相近。其实不然。

第一层应当注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为:“各种观念是由于各种感觉所引起的;感觉乃是人对于外界环境直接起的反应作用;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定,尤其是每一社会阶级的行为是如此。”仅仅承认在心理方面说来,每一社会阶级对于自己有益的真理,对于那种能够做自己阶级斗争的好工具的学说格外接近些;却并没有承认一切有益的学说都是真理,亦没有承认人的愿望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标准、真理的规范,更没有承认知识的内容是主观的。

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我们对于外物的概念确能与外物相符合。因此,我们要利用外物,只能尽他